



## 宫力：通向建交之路的艰难跋涉——1972-1978年的中国对美政策（下）

时间:2005年11月1日 作者: 宫力 ( )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来源:冷战史研究网

中美谈判的焦点是中美建交后的美台关系问题。因为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起直到中美谈判建交，美国根据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不仅在台湾大量驻军，还对台湾提供了高达59.8亿美元的援助，其中42.2亿美元是军事援助，17.6亿美元是经济援助。[87]由此，不仅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统一事业，而且造成中美之间的严重对立。为了解决这一历史难题，中方在谈判中提出的基本立场是：1、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这个问题是美国政府派兵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干涉中国内政造成的，解铃还需系铃人；2、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必须履行断交、撤军、废约三原则；3、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同台湾之间还可以继续保持民间来往，美国还可以在台湾设立民间机构，但美国不应该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4、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88] 美方则在售台武器和“终止”而不是“废约”以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几点上讨价还价。售台武器问题最初是在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与中国驻美联络处副主任韩叙之间的特别渠道间进行的，而在主要的谈判中没有涉及，其目的是为了保证这些主要的“谈判不受不愉快问题的干扰。”[89]

在此期间，邓小平再次打出经济牌，向美国施加压力。8月6日，他在会见奥地利客人谈到中国吸收外国先进技术时，提到美国说：“当然我们也跟美国人讲清楚，因为双方关系没有正常化，同样的条件、同样的技术，我们优先考虑的是关系正常化的国家、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这是合情合理的，至于其他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可以加以比较。”[90]

美国总统卡特对中美建交谈判进程也很关注。9月19日，卡特会见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并且说：“如果美在正常化以后继续向台湾“有限度地出售经过十分小心选择的防御性武器”和美在正常化时发表“期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声明这两个问题“满意地解决，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就不会有其他障碍”。[91]布热津斯基后来回忆说：“卡特总统在谈到坚持向台湾出售武器和坚持发表一个不受中方反驳的，大意是我们希望台湾问题能够得到和平解决的声明的重要性时给人留下的印象很深。”[92]

1978年10月，久拖不决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取得突破，邓小平访问日本。他在与福田首相的会谈中，谈到台湾问题。他指出：“我们将在充分尊重台湾的现实的基础上，来解决台湾问题。采用日本方式也是尊重台湾现实的一种表现。美国总希望我们承担义务，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如果这样，反而会成为和平统一台湾的障碍，使之成为不可能。”[93]

10月25日，邓小平在日本回答记者提问中美关系正常化进展时说：“中美双方正在谈这个问题。这恐怕也是大势所趋。中美关系从1972年发表了中美上海公报以来，有了不断的发展，现在还在继续发展，但是还没有正常化。障碍就是一个台湾问题。我们向美国指出了实现正常化的条件，就是美国同台湾的关系实现三条：废约、撤军、断交。这方面我们要等候美国的考虑。”[94]

这一次，中国方面没有等多久。10月30日，布热津斯基约见柴泽民，表示卡特总统希望加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进程，如中美关系发生“决定性和建设性进展”，今年12月和明年1月将是“历史性的重要机遇”，希望双方不要错过这个机会。[95]否则，美苏核条约或其他问题先列入议程，中美关系问题将会被推迟到1979年秋后，时机不当，会出现困难。另据柴泽民回忆：“布热津斯基召见了，说现在是解决中美关系最好的时机。如果现在不解决，到明年秋季国会开会，就会着重讨论与苏联的关系问题，这样一来，事情就可能拖延下去，拖延到1979年秋季以后。我把这个意见告诉国内，报告可能使国内感觉到了这个问题解决的迫切性。”[96]

随后，在11月2日举行的第五次会谈时，美方提出了联合公报草案，一共16条。主要内容包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并互相建立外交关系；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非官方关系；美国行政部门将为调整与台湾的关系向立法部门提出特别立法。草案提出，中方可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中国统一问题是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的事情，别国无权干涉。中国还应表示，统一问题将和平地实现；美方将表示，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不提出异议，重申对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97]

邓小平在仔细分析了中美会谈的进展情况后，决心要加快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步伐。1978年11月2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看了布热津斯基同柴泽民的谈话和外交部报来的同伍德科克第五次会谈的请示，看来美方想加快正常化，我们也要抓住这个时机，当然不一定赶在美苏限制战略武器第二阶段协议之前，同美国关系正常化要加快，从经济意义讲也要加快。原则当然不放弃。可以按美方提的问题谈。谈的时候不要把门关死”。11月27日，邓小平又召集有关人员开会，指出“最重要的是不要错过时机”。[98]

邓小平还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对外发出信息，解释中国对台湾的政策。11月14日，邓小平在途经缅甸回国时，同缅甸总统吴奈温会谈。指出：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99]11月27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专栏作家诺瓦克时指出：“如果站得高一点看，不管是中国政治家或是美国政治家，都认为中美早点实现正常化好，越早越好。如果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首先是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安全和稳定的因素的话，我想中美关系正常化对全球的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意义还要大。”他还说：“解放台湾是我们祖国统一的事业，我们也要尊重台湾的现实。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台湾存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它们可以保留原来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这是在国家统一的情况下允许保留的。”[100]在这里，邓小平实际上已提出了“一国两制”的基本要素，这是对台政策的一个重大进展。

针对美国要求中国承诺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1978年11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蒂尔时指出：现在中美关系的焦点恐怕不是三个条件问题。美国方面要中国承担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这不行。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上，我们最大的让步就是允许采取日本方式，美国可在台湾继续投资，继续保持它的经济利益。我们多次讲过，台湾归还中国，实现祖国统一，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将尊重台湾的现实来解决台湾问题。台湾的社会制度同我们现在的社会制度当然不同，在解决台湾问题时，会照顾这个现实问题。[101]

这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都有了新的发展，要求中国领导人抓住时机，早下决断。由于中越关系急剧恶化，中国已在考虑对在边境不断挑衅的越南采取惩罚性的有限反击。另一方面，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邓小平建议提出的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

上来的问题。此时，中美建交问题虽然没有正式提交会议讨论，但邓小平肯定是将中国现代化建设问题与中美关系问题结合在一起加以考虑的。因此，邓小平这时在与一些负责人谈话中，谈到中美建交问题时，强调“这确实是个大局。”[102]这些因素都增加了中国领导人尽早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决心。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于12月1日召集与会的部分省委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由邓小平向他们通报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在考虑的问题，其中第一条就与中美建交谈判有关。[103]

在这种背景下，12月4日，韩念龙在中美建交第六次谈判中提出中方的六点方案：1、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在这方面美国是欠了中国的债，不是中国欠了美国的债，“解铃还需系铃人”；2、欢迎卡特总统在9月19日会见柴泽民主任时的正式表示，美国愿意履行中国政府表明断交、撤军、废约三点，这应在联合公报中得到反映；3、同意干脆一揽子解决，不同意搞“中间阶段”，确定在一个时限内完成断交、撤军、废约三点后，才能互派大使，建立大使馆；4、正常化以后，美国同台湾之间的联系，可以按照“日本方式”处理；5、美方提出在正常化以后准备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中方已明确表示这是不能同意的；6、中国人民何时、用何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这不是中美间讨论的问题。美方可以发表期望和平解决的声明，中方亦发表声明。对此，伍德科克表达了美方的积极态度，但在售台武器方面仍提出，继续以不危及该地区和平前景及中国周围地区形势的方式向台湾出售有限的、经过挑选的防御武器。美方表态的要点是：一、公报发表后，美国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撤销对台湾的承认，关闭驻台使馆，同时召回美国大使，一年内撤出一切军队和设施。二、美国将保持与台湾的商务、文化联系，包括美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仍向在台企业提供资助、信贷和信用保证。继续美台原子能合作，以保证其非军事性质。继续保持航空和海运联系，现行关税安排仍旧有效。继续以不危及该地区和前及中国周围地区形势的方式向台湾出售有限的、经过挑选的防御武器。三、在台湾设立非官方机构，由不在政府任职的人员担任，但机构的部分资金由国会拨款，这和日本做法一样。四、由国会通过立法调整（原来与台湾的关系），但不会构成对台湾的外交承认。[104]

在中美建交谈判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于1978年12月13日至15日连续三天与美方代表伍德科克进行了四次会谈。在12月13日的会谈中，伍德科克表示：1、美方确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2、公报发表后，美国立即终止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四个月内撤出美国军队和设施，并立即通知台湾终止防御条约；[105] 3、美国和台湾人民之间维持非官方关系；4、美国同台湾人民之间维持商务和文化联系；5、美国将发表声明，期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希望中方不予反对。[106]他还递交了按上述意图重新起草的联合公报草案，并提议双方确定1979年1月1日发表建交公报和有关声明，3月1日互派大使和建立大使馆。美方希望双方能够商定美方邀请中国领导人访美时间。邓小平基本同意美方新的联合公报草案，但提出在公报中应重申反霸条款，以加重分量。鉴于美方提出一年后“终止”美蒋条约。邓小平要求美方在该条约仍然有效的最后一年里不要再向台湾出售武器。[107]

然而，正在中美建交谈判就要大功告成之时，中美在美国在中美建交一年后是否仍售台武器的问题上又出现严重的纷争。据美方霍尔德里奇回忆：“在正常化的磋商中，中国要求停止出售武器，我们拒绝了。我们的谈判曾经因这个问题几乎失败。”[108]12月14日，伍德科克奉命紧急会见邓小平提出，为了减少泄密的机会，美方建议北京时间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华盛顿时间12月15日晚9时同时宣布建交公报。建议邓小平1979年1月29日、30日和31日开始访美。邓小平表示赞成，同意于1979年1月29日访美。

当天晚9时，伍德科克又奉命紧急会见邓小平，答复中方13日提出的问题：美方同意在公报中写上反霸条款；同意声明中不写一年后终止美蒋条约事。12月15日，伍德科克又求见邓小平，要求澄清美方能否

在记者问到时说1979年后可向台湾出售有选择的武器。对此，邓小平回答：如卡特总统对外说向台湾出售武器，我方不同意。如卡特谈话涉及此事，中方也要立即表态。现在要避开不谈，“以后我们双方再来讨论”；“最重要的是，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从长远讲，将会对中国以和平解决台湾回归祖国问题设置障碍，最终只能导致武力解决。”[109]伍德科克答应立即报告美国政府。邓小平还提出：“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政府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不要影响中国采取最合理的方法和和平解决台湾问题”。[110]

从中美建交谈判的最后结果来看，中美双方都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首先，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问题上，中国原来坚持建交前必须废约，后来体谅美方困难，同意美方在法律生效期满之时“终止”该项条约。第二，美方原来要求在建交之际将单方面发表声明，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而中国不要予以反驳。后来经邓小平提议，双方通过协商，决定各自都可以发表声明陈述自己的立场。中国方面后来在声明中指出：“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111]不过，中方在许多场合也表明了愿意采取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112]第三，在最棘手的美国对台出售武器问题上，双方决定保留分歧。中国保留以后重新提出这个问题的权利，美方则表示相信，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将会逐渐出现有利于讨论这个问题的气氛。[113]美方还保证在美台条约仍然有效的最后一年里不向台湾出售武器。双方一致同意不因这一问题影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时间表，从而表现出向前看的长远眼光。

至此，中美建交谈判终于取得了“突破”。这是中美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从中方的角度讲，邓小平的最后决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双方达成上述协议的基础上，中美两国于1978年12月16日（美国时间12月15日），共同发表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正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114]从而结束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同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将近30年的关系不正常状态。

## 七、结论

以上的研究表明，1972-1978年中美关系和中国的对美政策的发展变化经历了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发表后，中国决策层在对美关系方面，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更加强调“灵活性”，但中国方面对美国是否履行上海公报并没有十分的把握。因而中国决策层在对美关系问题上采取了既积极又慎重的态度。经过一年多的观察。中方满意地看到，中美关系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迅速发展，美国最终在巴黎和平协定上签字，这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在1973年提出了一条线的联美抗苏的战略，并与美商定，在各自的首都建立了联络处。这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进展。

但在此之后，美国方面由于水门事件，没有兑现在尼克松第二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诺言，从而给中美关系正常化造成了困难。台湾问题十分敏感，中方在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问题上回旋余地相对较少，只能守住建交的三项基本条件，以“日本方式”为底线，要求美国同台湾断交、废约、撤军，同时静观美方的变化。因此，从1974年到1978年5月，中美关系正常化陷入僵局，主要责任不在中方。中方坚持按美国曾经承诺过的“日本方式”解决问题，反对美方提出的倒联络处方案，是合情合理的。1976-1978年，中国领导层处于调整、过渡期间，对美政策也在酝酿新的变化。

在1978年中美关系正常化重新提上日程后，中国对美政策的决策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由于“四人帮”的垮台，党内健康力量已占据了主导地位，邓小平成为中方对美政策的主要决策人。这一点对中美关系的发展非常重要。这一时期中美建交谈判的焦点转到建交后，美国对台出售武器和以何种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上。在这两个问题上，中方虽然坚决反对美国在建交仍向台湾出售武器，但大局出发，决定保留重新提出这一问题权利，以不影响建交时间。在解决台湾的方式上，中国最大限度地表现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但为了防范台独，不承诺不使用武力。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有远见的决定。而美国以变通的方式，基本上承认了中方提出的建交三原则。这是中美建交的政治基础。

纵观1972-1978年的中美关系和中国的对美政策，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在这一问题上，美国政府曾经低估了中国方面维护祖国统一的决心，并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做出大的让步。但这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中国方面在维护国家统一问题上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她决不可能容忍台湾永久地分裂于祖国大家庭之外。应该说，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中国政府在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所表现出的强烈的民族感情给美国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它反映了中国人民对近百年来遭受西方列强侵略、欺负的深恶痛绝，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于别国染指中国领土的高度敏感的心理状态。认清这一点，对于发展中美关系十分重要。

2、中国决策层始终从战略的高度来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尽管1973年后，美国因水门事件，没有兑现在尼克松第二任期内解决台湾问题的诺言；尽管美国对于美苏缓和极为热衷，中国方面对此相当不满，但由于国际战略的需要，中国仍然对美国实行“一条线”的战略，尽量避免中美关系倒退，借此拉住美国，以对付苏联，这是中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同时也无需讳言，由于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处理得过分僵硬，使中国在对美关系方面讨价还价的地位受到一定的削弱。当1978年，美苏矛盾再次加剧时，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平衡作用再次显现出来，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加速了。

3、中美关系正常化固然有苏联因素起作用，但中美关系的发展更有自身的基础和内在的动力。从中国方面来看，与西方的头号强国美国改善关系，有助于中国恢复和加强同外部世界的联系。事实证明，中美关系改善的确在世界上引起了连锁反应，为中国同西欧、日本等重要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打开了通道。这样，到了1978年底，中共中央决策层准备实施意义深远的改革，使中国向整个世界开放的时候，中国实际上已经同世界上几乎所有重要的国家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关系的改善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此外，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需要学习和借鉴象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科学的管理方法，需要从美国那里取得发展经济所缺少的资金和技术。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至经济建设方面来，与中美建交、两国关系正常化几乎是同步，其中确有一种互动的内在联系。

4、对美国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是这一时期中国对美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把中国共产党人在过去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统一战线经验引进到中国对美关系方面，对美国采取了既联合又有斗争的方针，即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扩张等一致的方面实行联合，同时又保留对美苏缓和的批评权利，同时注意独立自主地维护国家主权，同美国妨碍中国国家统一的行为进行必要的斗争，并在斗争中注意掌握分寸，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以便留有回旋的余地。

5、由于历史的局限，特别是中国还处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氛围之下，毛泽东指导下的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不可能完全摆脱“左”的干扰和影响，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论点和论据也有某些缺陷和某些不切合实际的地方。例如，毛泽东当时对于爆发战争危险的估计存在较大的偏差，对于苏联社会性质

的认定和苏联对中国威胁的程度估计过于严重，并对此做出了一些过度的反应。但这些局部的不足之处并不会从总体上影响中国对外战略调整的深远意义。不管怎样，在70年代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战略调整扭转了中国两面受敌的不利局面，并使中国获得了远超出自己实力的国际地位，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形成了影响全局的美苏中大三角关系，使中国外交迎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这就为中国以一支独树一帜的重要力量全面参与国际事务开辟了道路。

6、中美建交的意义是深远的，由于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所倡导的反对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扩大了，[115]中国的外交基础由此更加巩固。这对于遏制当时苏联的扩张势头和越南的地区霸权主义起到了有力的作用，对维护和加强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中美双边关系从此也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此，“中美关系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116]随着联结两国关系纽带的恢复，两国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乃至军事上的交流与合作都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全面发展。这不仅为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也为美国重整国力赢得了时间和回旋的余地。历史经验告诉人们，中美两国和则两利，斗争则俱伤。认清这一点，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系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办的“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再探讨”国际研讨会论文，2001年1月18-19日，北京；部分内容发表于《党的文献》，2002年第2期；全文收入宫力、威廉·柯比、罗伯特·罗斯主编《从解冻走向建交：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再探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出版。）

#### 注释

[1] 详见《周恩来讲解中美〈联合公报〉纪要》，1972年3月3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9页。

[2] 外交部的通报稿写道：“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在美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国际上震动也很大。总的说，对公报的反映是积极的，大都认为这标志着中美关系有一个新的开始，国际形势将发生重大变化。这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转折，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这些协议还是纸面上的，能否实现还要看美国今后的实际行动。今后事态发展还会有曲折反复，我们必须有所准备”。

[3] 1972年3月6日，毛泽东在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四个单位拟编发尼克松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国际反映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似可不必这样编发，近似张扬”，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92页。

[4] 《对外交部关于中美联合公报通报稿的批语》，1972年3月6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291页。

[5] 《中共中央关于中美联合公报的通知》，1972年3月7日，中发[1972]第10号。

[6]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使华时与周恩来达成协议，开辟了巴黎秘密渠道作为中美进行联系的新地点。当时，中方担负这项秘密使命的是中国驻法大使黄镇，美方的联系人是美国驻法使馆武官弗农·沃尔特斯（Vernon A. Walters）。利用这条渠道，中美双方进行了45次秘密会谈。在此期间，基辛格曾利用参加巴黎和谈的机会，与黄镇进行3次秘密会谈。

[7] 在此之后，中美各自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取代了中美巴黎公开渠道。

[8] 1972年6月19日，基辛格第四次访华，向中国领导人通报了美苏最高级会晤和达成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情况。

[9] 中美在纽约的接触始于1971年11月。当时，基辛格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会见，开辟了纽约渠道。有关情况详见William Burr ed.,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 The Top Secret Talks*

- [10] 原来中国有关部门曾拟定由李梦华担任团长，上报周恩来后，改为庄则栋任团长。
- [11] 中美上海公报曾明确指出：“双方把双边贸易看作是另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并一致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他们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详见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北京，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 [12] 有关数字转引自尼克松总统致送国会的报告：《七十年代美国对外政策：缔造持久和平》，1973年5月3日，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第106页。
- [13] 周恩来与金日成的谈话，1972年8月24日。
- [14] 在1971-1972年间，中国曾把结束印度支那战争视为同美国改善关系的首要障碍，而把台湾问题当作第二位的障碍。毛泽东当时曾说：“美国要从越南撤军，台湾不慌，台湾没打仗，越南在打仗，在死人呀！我们让尼克松来不能就为自己”。参见魏史言：《基辛格秘密访华内幕》，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2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2页。
- [15] 《周恩来与尼克松举行的四次限制性会谈记录》，1972年2月22-25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下，第1107页。
- [16]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79页。
- [17] 《公报》，1973年2月22日，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第9页。
- [18] 实际上，中国方面早在1971年5月就设想在中美之间建立联络机构的问题。1971年5月25日，周恩来召集外交部领导成员开会，商讨给尼克松的口信问题。26日，他又召集并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美会谈的方针。其中考虑到美方在台湾问题上态度的转变要有一个过程，不会完全答应中方的全部条件，但中美关系的缓和又需要有稳定的沟通渠道，因此，会议提出，如果在台湾问题上，美方不能完全满足中方条件，“中美不便建交，可在双方首都建立联络机构”。《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1971年5月29日，中发[1971]第40号。
- [19] 外交部：《外交通报》第12期，1973年2月24日。
- [20] 中方对苏联增兵的估计，见外交部：《外交通报》第12期，1973年2月24日。
- [21] 《毛泽东会见基辛格时的谈话》，1973年2月17日，外交部[73]办文特1号；1974年1月5日，毛泽东又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进一步提出了“一大片”的构想，即指“一条线”周围的国家。其目的要团结这“一条线”和“一大片”的所有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国际上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势头。
- [22] 外交部：《外交通报》第12期，1973年2月24日。
- [23] 当时任中国驻法大使，黄镇不仅参加过长征，当过将军，而且是当时中国驻外大使中少有的中共中央委员。
- [24] 当时担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也是老资格的外交官；后来曾于1985至1989年担任中国驻美大使。
- [25] 耿飏、姬鹏飞、王幼平、韩念龙：《怀念老战友黄镇同志》，《人民日报》，1990年5月3日。
- [26] 王永钦编：《1966-1976年中美苏关系大事记》（四），《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105页。
- [27] 《毛泽东与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纪要》，1973年7月4日，外交部[73]办文特17号。
- [28] 《人民日报》，1973年9月1日。
- [29] 《人民日报》，1973年9月1日。
- [30] 当时中国对苏联的特定称谓，意思是说，苏联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质上的“帝国主义”。
- [31] 参见王永钦：《毛泽东与基辛格》，《党的文献》1997年第1期，第93-94页。
- [32] 上述毛泽东的讲话详见《毛泽东关于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等问题的谈话要点》，1973年12月；以及《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时的谈话》，1973年12月21日。

- [33] 当时，布鲁斯和黄镇均不在对方首都。
- [34]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68页；薛谋洪、裴坚章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25页。
- [35] 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
- [36] 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
- [37] 美新处华盛顿1974年8月9日电。
- [38] 《福特总统在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的讲话》，1974年8月12日，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第265页。
- [39] 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第106页。
- [40] 杨亲华：《党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对台工作》，《党史研究资料》，1997年第2期，第21-22页。
- [41] 法新社北京1974年10月21日电，《参考消息》，1974年10月23日。
- [42] 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第113页。
- [43] 这项法案解除了美国国会1955年1月通过的关于防卫台湾的决议案，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第265页。
- [44]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83页。
- [45]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69页。
- [46] 即在北京设大使馆，在台北设联络处的方案。
- [47] 薛谋洪、裴坚章主编：《当代中国外交》，第226页。
- [48]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第370页。
- [49] 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第116页。
- [50] 宫力：《跨越鸿沟：1969-1979年中美关系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7页。
- [51] 美新处华盛顿1975年5月6日电，《参考消息》，1975年5月10日。
- [52] 美新处华盛顿1975年5月6日电，《参考消息》，1975年5月10日。
- [53]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 [54] 邓小平会见美国世界事务组织领导人代表团时的谈话，1975年10月11日。
- [55]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第368页。
- [56]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2页。
- [57]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第371页。
- [58] 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记录，1974年11月12日。
- [59]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第368页。
- [60] 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页。
- [61]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第372页。。
- [62]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3页。
- [63] Victor Louis, "Moscow Is Waiting for Gesture from Peking", France-Soir(Paris), Oct. 14, 1976.
- [64] "Secretary Kissinger's News Conference at Harvard, October 15", State Bulletin, Vol. 75(Noveber 8, 1976), p. 579.
- [65] "Secretary Kissinger Iterviewed on 'Face the Nation'", October 24 , State Bulletin, Vol. 75(Noveber 15, 1976), pp. 608-609.

[66] Jimmy Carter, *Keeping Faith: Memoirs of President*,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2, p. 190.

[67] 李捷: 《从解冻到建交: 中国的政治变动与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国际研讨会论文, 2002年1月, 北京。

[68] 资中筠主编: 《战后美国外交史》下册,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年版, 第813页。

[69] Edward W. Chester, *The Scope and Variety of U.S. Diplomacy History: Readings Since 1900*, Vol. 2, New Jersey 1990.

[70] 美新处印第安纳州南本德1977年5月22日电, 《参考消息》, 1977年5月25日。

[71] 《参考消息》, 1977年7月2日。

[72] 冬梅编: 《中美关系资料选编》, 第275页。

[73] Cyrus Vance, *Hard Choice: Critical View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mon and Schuster, 1983), pp. 82-82.

[74] 外交部档案馆编: 《伟人的足迹: 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 第155-156页。

[75] Robert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 and China, 1969-198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04.

美国政治与法律网 (www.ciapl.com) 转发 2005年11月1日

[\[回顶部\]](#)